

社会组织与社会治理丛书

冯钢/主编

Democracy in Living World:
Searching the New Political
Culture of Contemporary China

生活世界的民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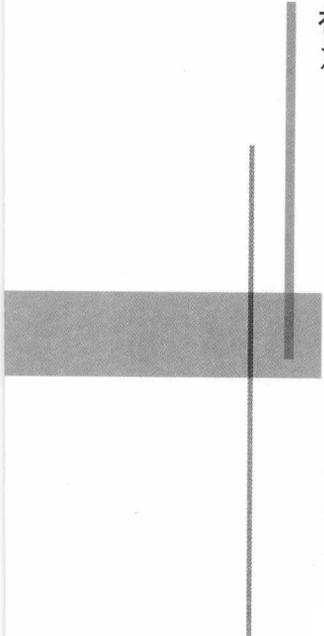
——探询当代中国的新政治文化

潘一禾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社会组织与社会治理丛书

冯钢/主编

生活世界的民主

——探询当代中国的新政治文化

潘一禾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活世界的民主: 探询当代中国的新政治文化/潘一禾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10

(社会组织与社会治理丛书)

ISBN 978 - 7 - 5097 - 1778 - 3

I. ①生… II. ①潘… III. ①社会主义政治学 - 研究 - 中国 IV. ①D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76097 号

· 社会组织与社会治理丛书 ·

生活世界的民主

——探询当代中国的新政治文化

著 者 / 潘一禾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 政 编 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社会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156

电子信箱 / shekebu@ssap.cn

项目经理 / 童根兴

责任编辑 / 谢蕊芬

责任校对 / 张晓媛

责任印制 / 岳 阳 郭 妍 吴 波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宝蕾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20

印 张 / 20 字 数 / 322 千字

版 次 /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1778 - 3

定 价 / 45.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1 引论：关注当代中国的生活民主建设

- 14 第一章 民主的三种基本理解
 - 第一节 民主的共享与殊荣 / 14
 - 第二节 民主概念的三层基本意思 / 21
 - 第三节 民主制与君主制，孰胜孰优 / 27
 - 第四节 为什么要强调“生活民主” / 33

- 42 第二章 关于民主的中国进程
 - 第一节 每三十年一个转折？ / 42
 - 第二节 民主政治的先决条件问题 / 51
 - 第三节 从制度先行到经济先行 / 57
 - 第四节 以人权为本和以民主促民生 / 63

- 70 第三章 从传统民本到现代民主民生
 - 第一节 中西共享的传统民本主义 / 70
 - 第二节 率先走出传统习俗的力量 / 78
 - 第三节 从经济先行到以民生为本 / 84
 - 第四节 当代中国的新政治文化探求 / 89

- 98 第四章 杜威的生活民主观及启示
- 第一节 杜威的创新性民主理解 / 98
 - 第二节 杜威面对的美国问题及中国相似性 / 103
 - 第三节 “新个人主义”和“民主共同体” / 110
 - 第四节 探询现代社会控制的“新政” / 115
- 124 第五章 杜威的大共同体设想
- 第一节 为公众参与而辩 / 124
 - 第二节 比政体民主更广泛深入的生活民主 / 134
 - 第三节 工业化、大社会及其后果 / 141
 - 第四节 从大社会到大共同体 / 148
- 156 第六章 中国式生活世界的哲学反思
- 第一节 聚焦“生活世界”及研究意义 / 156
 - 第二节 文化哲学家的当代中国生活世界关注 / 162
 - 第三节 破解传统的日常生活世界 / 169
 - 第四节 中国式生活世界对现代性的捍卫和拒斥 / 174
- 185 第七章 重视生活世界的西方后现代民主
- 第一节 现代民主政治的实现途径 / 185
 - 第二节 现代社会民主与生活民主 / 193
 - 第三节 后现代的文化民主化及困境 / 198
 - 第四节 生活世界中的人际交往民主 / 207
- 215 第八章 参与民主理论和工作世界的民主
- 第一节 参与民主理论的复兴 / 215
 - 第二节 更深更广的现代公民参与实践 / 219

- 第三节 非政府权威结构中的参与活动 / 226
- 第四节 日常工作领域的民主 / 233

- 244 第九章 公民身份理论与中国中产阶级问题
 - 第一节 关于当代中国“中产阶级”的担忧 / 244
 - 第二节 中国需要“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 / 249
 - 第三节 中产阶级的复杂身份与复合需求 / 254
 - 第四节 闲暇与娱乐生活中的民主 / 262

- 273 第十章 私人生活领域的民主
 - 第一节 现代性视野中的“情感民主” / 273
 - 第二节 纯粹关系的内容及特点 / 282
 - 第三节 私人生活领域中的协商手段 / 288
 - 第四节 以民主方式进行的教育 / 294

- 307 第十一章 信息时代的网络民主
 - 第一节 网络传播的特点与“狂欢文化” / 307
 - 第二节 传统民主困境与网络民主的兴起 / 315
 - 第三节 网络民主争论的实质及其缺陷 / 323
 - 第四节 网络与生活世界的民主 / 330

- 336 结语：共建生活方式的民主

- 348 附录：生活世界民主的日常案例精选

- 393 后记

引论：关注当代中国的生活民主建设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当代中国的政治和政治学研究也同时实现着从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的转型。复旦大学国政系教授孙关宏撰文《中国政治学 30 年》总结说：“改革开放 30 年大致可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第二个阶段是从突出经济建设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齐头并进。第三个阶段是从强调政治建设到同时强调社会和谐建设。”伴随着这种中国政治的渐进转型，当代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在逐步“科学化”的同时，也面临如何从“国家学”变成“社会学”的问题。

诚如孙教授所说：“在我们的政治研究中，占第一位的是政党，第二位是国家和政府，第三位是社会，第四位是公民个人。这四个领域受重视程度呈递减趋势。”目前政治学界对中国政治文明发展的评述还较多地集中于国家、政府和政体，对中国社会、中国公民和中国传统日常生活模式的悄然变化关注仍很不够。“中国政治学者们还必须加强对社会问题、社会组织、社会关系及其制度性的研究，特别加强对人的生存状况、人的生活意义的关注，关注公民权利的实现程度。”^①

^① 孙关宏：《中国政治学 30 年：科学与人文的考察》，2008 年 10 月 16 日《社会科学报》。

30年的改革开放热潮不仅带给中国社会和政治以深刻的变迁，而且推动了当代中国的“生活世界民主化”进程。值得注意的是，不仅中国政治学界和舆论界对社会层面、公民状况、生活世界的研究相对薄弱，包括一些海外中国问题研究者的视野也往往局限于国家、政府和政体。例如2007年3月17日，美国学者本杰明·肖伯特在《亚洲时报》发表题为“中国的第三条道路”的文章，介绍詹姆斯·曼（James Mann，中文名孟捷慕）的新书《中国幻想》（*The China Fantasy*）。本杰明·肖伯特认为孟捷慕的如下观点值得重视：中国未来既不会大崩溃，也不会走向民主化和顺利发展，中国未来可能的局面是，经济富有但政治体制中的一些基本因素仍会基本保持下来。^①

孟捷慕是一名长期从事中美关系问题研究的专家，对中国有着20多年的观察和诸多来访，他的中美关系名著《关于面子：奇特的中美关系史》，是美国研究中美关系学者的必读之物。孟捷慕在他的新书中列举了当前有关中国的三种预测性断言：一是中国的经济必将崛起，二是中国的经济将不可避免地崩溃，三是中国将由于经济的发展而走向民主化。但他提出的是自己的“中国将来”的三种可能格局。

（一）“安慰人心的格局” 贸易是打开中国的钥匙，贸易带来政治自由，中国走向民主。

（二）“动乱的格局” 中国走向某种重大灾难，罢工有增无减、农民抗议、环境恶化、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持续贪腐、经济崩溃或政治解体。

（三）“不变的格局” 继续目前的经济路线，丝毫不触及

^① 参见张春颖《孟捷慕的〈中国幻想〉简介》，《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10期。其中有詹姆斯·曼的思路的介绍。

政治体制的改变。

孟捷慕最为支持的是最后一种中国发展前景：“思考第三种前景，我们不一定要假定 25 年之后中国仍由现在的执政党领导。名字和语言都有可能改变……然而，现行的政治体制中的一些基本的东西仍会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大的政治对立、出版自由以及超越地方的选举都不会出现。将会出现的是一个有力的安全机构，以防止有组织的政治反对者的产生。换言之，尽管中国会变得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富有，但是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其政治体制。中国会沿着同现在一样的政治路线走下去。”

2007 年 11 月 18 日，美国《国际先驱论坛导报》又发表了理查德·伯恩斯坦题为“以中国为主题的新书掀起轩然大波”的文章，强调孟捷慕的新书虽然不过是重复了自尼克松 1972 年恢复与中国的关系以来对华政策决策者已经怒斥过的一些论点，但仍然引发了今天的中国问题专家们的众多支持和反对意见。“辩论中始终存在的问题是：美国究竟应在多大程度上公开抨击中国大量令人震惊的侵犯人权的案例？人权目标究竟应在多大程度上与中国的实力和重要性相符？”^①

一些反对孟捷慕观点的美国学者批评他过于关注政治改革，因而未能正确评价中国十年来巨大的有益变化，在这些有益变化中最令人关注的就是：一个约有 2 亿至 3 亿人的中产阶级已经形成，他们享受着 15 年前难以想象的一定程度的个人自由。而另一位著名的中国问题学者兰普顿则认为：孟捷慕高估了美国对于中国政治发展的主导地位。如果民主能够在中国生根，那是因为中国自身的发展

^① 《国际先驱论坛报：〈中国幻想〉一书在美掀起轩然大波》，2007 年 11 月 20 日《参考消息》。

展所致，而不是来自外部的压力。^①

对于詹姆斯·曼或孟捷慕的观点及影响，已有《中国日报》英文版的中国记者撰文狠批，说它“缺少真知灼见”、“幼稚得近乎国内愤青网文”，观点“悲观”、“暗示中国不可避免会成为美国的敌人”，尤其是“逻辑有破绽”。“首先，他只关注民主制度这一项，认为只要有民主，这个国家就不会跟美国为敌。（他难道不想想巴勒斯坦民选出一个比巴解更反美的政府？）其次，他似乎不关心政治以外的细微变化，而这些变化应该是一个驻华新闻从业人员及中国问题专家应该关注并研究的。”^②

“中国最出名的外国人”马克·罗斯韦尔——“大山”，是一位在中国有二十多年居住、生活、工作经历，并广受中国人民欢迎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他在与英国记者谈及自己的特点时有意以第三人称的口气说：“20多年来，大山的形象逐渐变得有代表性，这种形象不同于偶像，他很像邻家男人的形象。我过的不是名人的生活。但我知道，一些外国人认为我过于温和，说大山缺少锋芒。”他对此发表自己的看法说：“西方对中国的整体认识过于政治化，因此我们中有人认为政治不代表一切很重要。”马克·罗斯韦尔显然想让中国人也能体会到：西方人也是各种各样的，观察中国的唯政治化和非政治化视角都应该存在，才可能避免彼此的毛病。英国广播公司网站的记者迈克·布里斯托的分析话中有话：“这样的外交语言正是大山今后一段时间仍将受中国人欢迎的原因。”换言之，“大山”的“非政治化”姿态更受中国人的欢迎。^③

① 2007年11月20日《参考消息》。

② 周黎明：《书评：〈中国幻想〉》（中英文），Tunnel gives partial vision by Raymond Zhou (China Daily)，载自 <http://blog1.poco.cn/myBlogDetail-htx-id-483124-userid-23294726-pri--n-0.xhtml>。

③ 《大山——中国最出名的外国人》，2008年6月16日《参考消息》。

尽管仅从政治体制、人权问题和西方式民主标准角度看中国的发展方向和未来可能，往往并不公正，但笔者依然认为詹姆斯·曼或孟捷慕提出的问题和讨论问题的视角，以及“大山”的提醒和刻意存异，都是很值得聆听、静思和探讨的，即中国的未来政治改革方案，中国民主进程的特殊路径，中国经济发展与政治改革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关系，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现代公民文化的建设方式，中国与其他民主国家的相互关系等，是值得解放思想、共同深究的。

长期关注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俞可平教授强调说，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都有自己的特色。我们必须及早认识到，公民社会是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必然产物，中国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就必然导致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的出现。在他看来，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的当代“中国特色”就在于都是“政府引导”型的，但这并不是说中外公民社会和民主政治之间没有共同之处。对各国人民而言，民主政治都是一个好东西。

对中国正在蓬勃发展的公民社会所遇到的问题俞可平做出了这样的分析：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各种各样的民间组织大量涌现，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正在中国迅速崛起，并且对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产生日益深刻的影响。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直接得益于制度环境的改善。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修改了宪法，进行了以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政府职能转变、建设法治国家等为重要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和规范民间组织发展的法律、规章和政策，转变了对公民社会的态度，所有这些都是直接促成公民社会迅速成长的制度因素。

俞可平认为：从目前的情况看，我国的公民社会大概有着以下

几个明显的特征。第一，中国的公民社会是一种典型的政府主导型的公民社会，具有明显的官民双重性。第二，中国的民间组织正在形成之中，具有某种过渡性。与西方国家的民间组织相比，它还很不成熟，其典型特征如自主性、志愿性、非政府性等还不十分明显。第三，与上述特征相适应，中国的民间组织还极不规范。第四，中国目前的民间组织发展很不平衡，不同的民间组织之间在社会政治经济影响和地位方面差距很大。他还提出：“我觉得一些学者用‘超女选秀’来简单类比中国的民主政治和公民社会运动，似乎并不十分恰当，因为日常生活毕竟与政治生活存在着实质性的区别，尤其在中国。我还是要再次强调，中国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就必然导致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的产生归根结底取决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①

也许是由于俞可平教授的政治学背景，所以他的观点与美国学者詹姆斯·曼或孟捷慕的观点有一点是相似的，即都聚焦于政治体制，而对当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方式变迁及意义并不十分重视。与此不同，另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变化和影响力正是因其生活方式的独特性和自主性，而引起了世界关注以及部分国家的担忧。比如目前在美国纽约大学东亚研究系任教的中国裔学者张旭东教授，最近撰文多篇批评美国观察东亚和中国的思维方式“幼稚”、“自恋”，具有大国衰退期的特殊防备心理。在他看来，美国眼里的东亚，特别是中国，具有不同寻常的含义，是因为它们在两个方面对美国式生活方式构成了威胁。

一方面是东亚，特别是中国的当代经济发展变化令人吃惊。美国公开的官方报告指出，今天的东亚是“国际商务活动和技术创新的中心”，是“过去二十年来全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区域”，其经

^① 俞可平：《中国特色公民社会的兴起》，2007年1月17日《21世纪经济报道》。

济总量占全球的30%，外汇储备占世界总储备的一半。该区域的几个国家“吸引了全球几乎一半的外资直接投资”，并且正在变成国际资本出口的一个主要来源，美国同东亚的贸易额已经超过它和整个欧洲的贸易额。与世界上其他区域相比，东亚地区是一个高度整合的经济实体：它既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包括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丰富资源）、大量训练良好的劳动力，又有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

但更为关键，也更让美国部分决策者担心的是，东亚诸国具有深厚悠久的历史、发达的国家传统（政治文化和道德文化传统）、强烈的民族认同，一旦走出漫长而痛苦的社会经济转型期，必定在生活世界的所有领域形成一套自主的秩序，在客观上（如果不同时也在主观上）形成对于美国制度的一种“成功的蔑视”。虽然张教授认为这种对于美国制度“成功的蔑视”在欧洲人那里早就形成，但“美国针对中国的种种战略部署，归根结底，在于防范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在东亚大陆出现一种美式资本主义框架之外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理想，一种独立于美国理念的人类历史远景”。^①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项目主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前主席兰普顿教授（David M. Lampton）新近出版的专著《中国的三张脸：威力、金钱、思想》也是美国学者研究中国的代表作品。兰普顿2008年5月告诉《环球时报》的记者：威力、金钱、思想这三个均以M开头的单词分别代表三种力量：威力（Might）为强制性力量，金钱（Money）代表经济力量，思想（Mind）代表文化力量。这三种力量的顺序反映了中国几代领导人思维演进的过程。兰普顿认为，中国有一种要成为综合性的全球大国的欲望，但中国不想成为昔日的苏联，只具备一种强制性力量；中国也不想成为日本，只具有经济影响力。目前，只有美国同时具

① 张旭东：《美国与世界》，载张旭东著《纽约书简》，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备这三种力量，是综合性的全球力量。中国有潜力具备美国这样的综合性力量，中国希望成为一个平衡的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中国的重点在后两个 M 上。这样一个发展目标决定了一个上升的中国并不对世界构成威胁。^①

中美之间、东亚与西方之间，肯定存在着文化上的差异，但因为彼此的历史差异和当代竞争，就将对手视为“你死我活”的敌手，已经是三十年前美苏冷战时期的旧思维模式，虽然今天仍存在顽固坚持这种思维模式的人，但肯定不是多数。不过今天的中美理论和言论交流中，双方都有一些人担心东亚与西方之间的历史差异过大，两者没有可比性；或者担忧两者“在生活世界的所有领域”拥有十分不同的内在“自主秩序”，所以在可见的将来不可能精诚合作和解决相互间的矛盾纠纷。当然也有一部分人认为应该对未来的冲突早做准备。

如果不是从简单狭隘的民族主义出发，不是从单纯的国家经济利益考虑，人们则会看到不仅中美之间、东亚和西方之间会有各自“在生活世界的所有领域的一套自主秩序”，就是其他非西方国家和地区，也必定有各自的生活世界和相关自主秩序。甚至同一国家或民族的内部也会出现一些地方性的经济、制度、文化、习俗上的差异，显现一些地区对地区的“成功的蔑视”。不同生活世界的“自主秩序”并不被地域和国界圈定，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更是如此。当然，国家内部的地区性、城市间的差异和发展不平衡，不会如国家间贫富强弱关系那样让人产生集体义愤和激发民族情感，因为在中国被称为是“人民内部矛盾”的差异和不平衡，往往能够通过中央政府的相关统计数据和监管程序，及时得到关注和调控。

① 冯建军：《中美问题专家兰普顿谈影响中美关系的几本书》，<http://www.chinavalue.net/blog/BlogThread.aspx?EntryID=61965>。

但这并不是说国家间的关系变化及走势，对国家内部的地区间、城市间关系处理没有参考价值。比如，中美之间的内在紧张，也常常被解释成是东西方文化之间在现代竞争中的内在紧张。这中间的差异和矛盾又总是与“现代/传统”、“普遍/特殊”这两个对子结合在一起，形成彼此的“先进/落后”假设。由于主要以美欧各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是率先开始现代化的，所以在现代化逐渐成为全球现象的过程中，西方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曾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被普遍认为是更多地代表和体现了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先进”制度。相比之下，现代化的“后进”国家如中国等，其社会特征和政治体系就更体现了“传统”、“特殊”和“前现代”的许多症状。同时对诸多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现代化的一个严峻挑战就是：不能让自己国家的现代化变成“西方化”、“美国化”的历程，一定要坚持自己的民族和国家特色，坚持自己独一无二的文化传统和历史记忆，不能被富裕的发达国家“和平演变”成他们的附属国。

应该重视的是，这种理解已经被重新反思和得到知识界的集体修正了。虽然今天的东亚仍保留了一些李光耀曾经总结的“亚洲价值观”，今天的中国也确有不少人提议尊儒教或尊“新儒教”、穿汉服、背古书、大学建“国学院”、城市拟建“儒教圣城”等，但同时近代以来的历史变革和生活世界变迁中，中国也早已将西方的智慧和其他的外来文化连续不断地融入自己的“自主秩序”之中。换言之，当代中国的现代“生活世界”里既有与美欧等西方世界一样的普遍性东西，也有本国家或本民族特殊的东西。全球化时代的现代中国已经开始拥有和追求一种既有特殊又含普遍，既有自我认同又以天下为怀的“生活世界”。

张旭东教授在2002年为北大学生所做的演讲中强调说：中国人自鸦片战争后遇到西方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和文化价值体系的全面

挑战，经由一个半世纪，中国人的生活世界已经由这一开始时是“外来”、现在是“全球性”的力量所决定和界定。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的中国完全是一个现代国家；当前的中国文化问题完全是现代性文化的内部问题。……19世纪的西方带给我们的器物和技术层面上的冲击，即工业革命以来的纪元性变化（其“普遍性”也许只有从石器时代到铁器时代的跳跃可以比拟），业已被中国社会吸收，“现代”在这个意义上已经“去陌生化”。与此同时，原先只是作为一种“他者性”的“西方文化”，现在却在全球化时代日益作为“文化本身”，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时代性问题。在这个新的历史关头，中国文化的自我认同不在于如何勘定同现代性和“西方文化”的边界，而在于如何为界定普遍性文化和价值观念的斗争注入新的元素。

作为一个生活世界和文化政治主体的当代中国，它必须按自身的逻辑将这种自我理解和自我认同在时空中展开，而不是依附于任何普遍性或个体性的修辞。但同样不言而喻的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展开，只有放在批判的世界史的语境里，才能显示出它自身的逻辑。……20世纪后期以来，全球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在扩张，并集中表现为全球经济的扩张。全球化在经济上为世界带来了巨大益处，但这只是就整体效益而言的，不同的区域经济、不同社会 and 不同阶层所受到的影响和结果是不同的。所以目前率先进行的经济和市场的全球化也是冲突的根源，因为它寻求的是以标准化的体系来改造世界，这使得现代化的全球化与地域性社会的特殊性之间会长期保持某种矛盾状态，而最终的结果只能是二者结合，即地域性社会不可能完全保存，全球势力也无法完全主宰。^①

这类对西方启蒙运动以来世界现代性思想观念史的批判和反

^① 张旭东：《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5页。

思，提醒我们超越“现代/传统”、“普遍/特殊”、“先进/落后”的划分和假设，注意西方和中国的现代化经历和经验教训里都有普遍意义的东西和特殊的东西。所以既要避免用先验的、无需论证的“中国立场”或“中国意识”思考问题，又不要将“他者”的立场和意识简单地当做自己一定要与之抗衡和竞争的“对手”，现代化全球化以来的中国和诸多他者世界，是相互区别更是相互联系的。与其说为了维护国家利益，“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不如说在国家利益和全球共同利益越来越显现密切关系的当代，人类必须共同放弃“敌人/朋友”式的二元对立思维，寻求全新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合作关系。全球化、信息化时期更被人们普遍提倡的政治开明和道德宽容，应该不仅容忍和理解与自己可能沟通与合作的“陌生人”，而且可以允许与自己十分不同又极难沟通的“陌路人”存在，并努力与之沟通和相互了解，保持这种沟通和理解的过程是多元并存、和而不同的，并且在经济和文化上互通互惠。

同样，中国的地方政府和某地居民，不仅要超越“现代/传统”、“普遍/特殊”、“先进/落后”的划分和假设，不仅要国家立场以国界意识看问题、看他国，听不同意见，还可以站在自己相对微观的“生活世界”和“自主秩序”中观察问题、思考问题。现代化的全球化进程，使得国家间出现了错综复杂的经济、军事、政治、文化的不均衡、不平等关系，当代中国的内部发展多样性也使得中国的经济“崛起”具有自身的不同阶段、不同层次、不同需求等的复杂含义。

所以我们应该意识到：在每个当代中国公民自己的“生活世界”里，目前享受到的许多现代化成就与遇到的现代性问题，与整个世界的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市场化等全球化进程是密切相关和彼此互通的。无论是外国的部分学者或政要，还是中国的名人